



CJEAS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第 2 卷第 7 號 2018 年 7 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台灣省議會與反對派的形成：

黨外議員的行動與戰略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印

目次

■ 摘要	I
■ 論文	
前言	1
台灣省議會：「台灣大」的民意代表機關	3
「五龍一鳳」時代的省議會	5
黨外與黨外政治：從政黨體系的觀點所做的分析	11
結論：「五龍一鳳」留下了什麼「遺產」？	14
■ 附記	i
■ 作者簡歷	ii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透過黨外的台灣省議會議員的行動與戰略，來分析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的台灣反對運動，也就是代議政治的反對勢力如何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基本假說，就是如果從所謂「台灣大」的民意來進行分析，台灣的反對勢力的發展起源可以回溯到台灣省議會，而且 1970 年代以後國會也朝台灣大的趨勢逐漸發展，當時黨外國會議員就是繼承了省議會的前輩們所累積、建構的思想與行動模式，本文希望能夠嘗試對這個假說進行初步的分析。首先，透過地方政治研究有關省議會的研究成果，與近年來在編纂方面相當有進展的省議會關連史料為基礎，以被稱為五龍一鳳（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李源棧、許世賢）的第一代黨外省議員為分析對象，探討（一）他們的言論的構造，（二）他們在國民黨政府的制約下基於什麼樣的思想、價值觀採取行動的模式，（三）黨外的領導人之間、領導人與支持者之間的人際網絡是如何建構、其運用的方式為何，（四）黨外議員在戰略上如何利用或維持與青年黨和民社黨等既有政黨之間的關係。然後以這些探討為基礎，進一步分析第一世代與下一個世代的黨外議員之間的思想與戰略上的延續性。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under the Koumintang's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 focusing on behavior and strategy of *Dangwai* assemblymen in Taiwan's Provincial Assembly. The basic hypothesis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sized" people's will, the rise of the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dates back to Provincial Assembly and their thought and behavior were inherited to politicians who led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70s. After reviewing extant literature and recently compiled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behavior and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Dangwai* assemblymen (Li Wanju, Guo Guoji, Guo Yuxin, Wu Sanlian, Li Yuanzhan and Xu Shixian) called "Five Dragons, One Fenix"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1)structure of discourse, (2)idea and value behind their behavior vis-a-vis governmental control, (3)personal networks developed between them and with their supporters, and (4)strategic use of existent parties (Youth Part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lso, the continuity in behavior and thought between these first generation assemblymen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Dangwai* politicians is discussed.

台灣省議會與反對派的形成： 黨外議員的行動與戰略

岸川毅

(上智大學全球學部教授)

黃偉修 譯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 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黨外的台灣省議會議員的行動與戰略，來分析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的台灣反對運動，也就是代議政治的反對勢力如何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說，就是如果從所謂「台灣大」的民意來進行分析，台灣的反對勢力的發展起源可以回溯到台灣省議會，而且 1970 年代以後國會也朝台灣大的趨勢逐漸發展，當時黨外國會議員就是繼承了省議會的前輩們所累積、建構的思想與行動模式，本文希望能夠嘗試對這個假說進行初步的分析。首先，透過地方政治研究有關省議會的研究成果，與近年來在編纂方面相當有進展的省議會關連史料為基礎，以被稱為五龍一鳳（李萬居、郭國基、郭雨新、吳三連、李源棧、許世賢）的第一代黨外省議員為分析對象，探討下列幾個問題：第一，他們的言論的構造；第二，他們在國民黨政府的制約下基於什麼樣的思想、價值觀採取行動的模式；第三，黨外的領導人之間、領導人與支持者之間的人際網絡是如何建構？其運用的方式為何；第四，黨外議員在戰略上如何利用或維持與青年黨和民社黨等既有政黨之間的關係。然後以這些探討為基礎，進一步分析第一世代與下一個世代的黨外議員之間的思想與戰略上的延續性。

從省參議會（1946～51）、臨時省議會（51～59）、到省議會時期（59～98）的台灣省議會相關研究，是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累積至今。其中議會史的研究以鄭牧心的《台灣議會政治 40 年》（1987）、李筱峰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增訂版）》（1993）、鄭梓的《戰後台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1946～1951）》（1993）為代表；從議員個人的特性來探討省議會的內涵與變遷的研究，以陳明通的《威權政體下臺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動（1945-1996）：省參議員及省議

錄與傳記出版，不過上述的兩類史料是基於共同的基準，有系統的針對將近 50 名前省議員的資料進行整理與訪談所編撰的，由於訪談對象不限於重要政治人物，因此口述記錄涵蓋了各種類型的前議員，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的把握議會的整體面貌。雖然這些史料並不包括許多已經過世的前議員的訪談，但可以幫助我們從其同事，也就是同時代的其他前議員的談話與評價對這些過世的前議員進行解讀。所以本文除了相關的先行研究外，也將特別以上述兩種史料體系為重心，進行分析。

二、 台灣省議會：「台灣大」的民意代表機關

觀察台灣的政治史時，如果要區分中央與地方，都會在名義或實務上出現不一致之處而不易進行討論。筆者想以若林正丈提出的「台灣大」²這個語彙，以統一整個討論的概念與用語。從所謂「台灣大」的民意機關的角度進行分析時，台灣的

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黃光平口述，《黃光平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章博隆口述，《章博隆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高育仁口述，《高育仁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許新枝口述，《許新枝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李炳盛口述，《李炳盛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張文獻口述，《張文獻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黃鎮岳口述，《黃鎮岳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林明德口述，《林明德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劉炳偉口述，《劉炳偉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吳復生口述，《吳復生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陳新發口述，《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魏綸洲口述，《魏綸洲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1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邱連輝口述，《邱連輝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臺灣省諮議會編、何春木口述，《何春木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臺灣省諮議會編、許信良口述，《許信良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臺灣省諮議會編、吳水雲口述，《吳水雲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年)；臺灣省諮議會編、吳伯雄口述，《吳伯雄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5年)；臺灣省諮議會編、林份廷口述，《林份廷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5年)；臺灣省諮議會編、蘇俊雄口述，《蘇俊雄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5年)；臺灣省諮議會編、華加志口述，《華加志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6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陳慶春口述，《陳慶春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6年)；臺灣省諮議會編、蔡讚雄口述，《蔡讚雄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6年)；臺灣省諮議會編、游錫堃口述，《游錫堃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6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黃金鳳口述，《黃金鳳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7年)；臺灣省諮議會編、陳錫章口述，《陳錫章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8年)；臺灣省諮議會編、簡維章口述，《簡維章先生訪談錄》(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10年)。

² 若林正丈，《台灣一分裂国家と民主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若林正丈，《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増補版)》(研文出版，2001年)。

議會是源自於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在追求自治的過程中促成了議會的成立，台灣光復後又在統一中國的地方自治的邏輯下再造，最後發展成為了不以追求統一中國為前提的民意機關。

推動所謂「台灣大」的政治運動是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受到戰間期民族主義世界性的高漲、大正民主運動的影響，蔣渭水、林獻堂、林呈祿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在日的台灣人菁英開始推動尋求自治與建立代議制的運動。他們一開始尋求設置台灣議會，但逐漸將重心放在改善地方自治，他們從 1921 年到 34 年之間就推動了 15 次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³，當中的成員包括了光復後擔任省參議會議員的林獻堂、臨時省議會與省議會議員的吳三連、高雄縣長的楊金虎等人。另一方面，台灣文化協會（1921 年成立，27 年分裂後成為台灣民眾黨）則以建立台灣文化與台灣人意識為目標，開始在台灣各地推動大眾啟蒙運動。雖然最後只實現了提高部分的自治程度（1935 年）與限定程度的中央參政（1934 年），但台灣人菁英們為了尋求台灣的自治所進行的活動，以及參與了受到限定的地方議會運作所獲得的經驗，可以視為是之後的議會政治的準備階段。

台灣第一次實施普選，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台灣大」選舉是地方選舉的層次，國民黨在台灣因為日本戰敗而回歸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後實施了選舉。首先是 1946 年實施的省級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選舉，雖然是透過縣市參議員的間接選舉，但是應選 30 人卻有 1180 人參選，可以象徵台灣社會在光復後對於政治參與的積極程度⁴。之後在 1951 年設置了同樣是透過間接選舉選出的第一屆臨時省議會，54 年的第二屆臨時省議會則改為直接選舉，成為了直接代表台灣選民的民意機關，57 年的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在任期中升格成為正式的省議會。

但這個最高民意代表機關卻在民主議會的功能上存在著幾個根本性的制約。第一個制約是台灣僅是中華民國的「地方」，最後的決定權掌握在實際的領域幾乎等於整個台灣的中央政府手中，而且這個中央政府是由國民黨所掌控；第二個制約是省主席的任命方式，省主席掌握了台灣省這個地方政府的最高決定權，但其產生方式卻是中央任命制，民意無法對其進行任何監督。第三個制約是來自於「黨禁」，由於國民黨政府實施「黨禁」，禁止新政黨成立，因此台灣省議會只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三個政黨，不屬於這三個政黨的候選人只能以無黨籍的身分參選，因此政黨競爭這個議會政治的重要關鍵因素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也就是說，透過台灣省議會能夠實現的目標，最多只有「基於民意選舉議員，議員透過審議反映民意」的部分，之後只能期待省政府能將議會的討論做為政策來實施。實際上在國民黨的強大的統制力下，省議會能夠發揮的地方非常有限。

不過雖然有這樣的制約，省議會仍然是代表台灣民意的最高機關，代表台灣基層社會的省議員們也為此努力。在大陸選出的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

³ 若林正文，前揭《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

⁴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頁 21-24。

因為屬於非常事態的內戰而持續沒有進行改選，成為了所謂的「萬年國會」，反而省議會雖然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但因為定期改選而可以代表民意，成為了唯一可以實踐「台灣大」議會政治的議場。許多前省議員一致認為，相較於不改選且非常沒有活力的立法院，透過選舉產生的省議會非常有活力、有存在感，可以說是政治的中心⁵。甚至在國會的增補選剛開始的時期，有許多人仍然優先將參選省議員視為目標⁶。

對省議員來說，與省政府（其背後就是中央政府）對立時的無力感，以及背負著民意的自負與活力可能都是一種現實，本文特別以後者為關注的焦點。省議會是地方選舉的最頂端，即使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干涉，只要選舉持續實施，就可以得到所謂身為人民代言人的自負感，而不斷與國民黨政府唱反調、不斷批判國民黨政府的黨外議員則使省議會成為更符合議會政治的議場。地方選舉在 1950 年代剛開始在台灣各地實施時，許多承受壓力但仍堅持貫徹自己信念，拒絕加入國民黨的人士成為了黨外議員，在台灣社會的基層不斷培養實力而成長。

三、「五龍一鳳」時代的省議會

在這樣的政界環境下展露頭角的，就是幾位被稱為「五虎將」、「五龍一鳳」的省議員。所謂的「五龍一鳳」指的是向國民黨政府挑戰，提出各種質疑的李萬居（參、臨 1、臨 2、臨 3/第 1、2、3）、郭國基（參、臨 3/第 1、2、4）、郭雨新（參、臨 1、臨 2、臨 3/第 1、2、3、4）、吳三連（臨 2、臨 3/第 1）、李源棧（臨 3/第 1、2、3）、許世賢（臨 2、臨 3/第 1、2、3）等六位黨外議員。如表所示，這六個人全部都擔任省議員的時期只有第三屆臨時省議會（任期中正式升格為第一屆省議會），他們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被稱為五龍一鳳，之後雖然並非六個人會同時當選，但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至少會有四個人擔任省議員。

李萬居（1901~66）在這六人當中算是重鎮，他是半山，當年以青年黨員的身分協助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在省參議會擔任過副議長，之後連任了六屆的議員。郭國基（1900~70）曾以國民黨員的身分協助接收台灣並當選省參議會議員，但在二二八事件時被逮捕下獄，之後離開國民黨，以無黨籍身分成功重返臨時省議會，他因為其激烈的性格與言論而知名，被稱為「郭大砲」。吳三連（1899~1988）曾以無黨籍國民大會代表、官派台北市長的身分參與了國民黨的台灣統治，並當選了第一屆的民選台北市長，之後又擔任了兩屆的省議員，他同時也是在台南擁有勢力

⁵ 臺灣省諮議會編、陳慶春口述，前揭書，頁 39；臺灣省諮議會編、林明德口述，前揭書，頁 54；臺灣省諮議會編、黃金鳳口述，前揭書，頁 61；臺灣省諮議會編、林份廷口述，前揭書，頁 26、33；臺灣省諮議會編、余陳月瑛口述，前揭書，頁 26-27；臺灣省諮議會編、許信良口述，前揭書，頁 30。

⁶ 臺灣省諮議會編、游錫堃口述，前揭書，頁 31-32。

的企業家。與李萬居同為青年黨員的郭雨新（1908～85）是參加補選而進入省參議會，他也以尖銳的辯才獲得了「小鋼砲」的外號，並連續七次當選省議員。李源棧（1910～69）在是當選高雄市議會議員後正式踏入政界，也連續當選了三屆省議員，在議場以激烈的動作與不妥協的言論而知名。許世賢（1908～83）擔任過嘉義市參議員，當選第二屆臨時省議會議員後，因為批判國民黨而與其決裂，成為了首位女性的黨外議員而聲名大噪。

表：「五龍一鳳」的議員在任時期（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省議會+立法院）

(就職年)	參 (1946)	臨一 (1951)	臨二 (1954)	臨三/ 第一 (1957)	第二 (1960)	第三 (1963)	第四 (1968)	第五 (1972)	第六 (1977)	第七 (1981)
國·非國	24·6	43·12	48·9	53·13	58·15	61·13	60·11	58·15	56·21	59·18
李萬居										
郭國基								69立補		
郭雨新										
吳三連										
李源棧										
許世賢								72立增	75立增	
其他的主要黨外議員	謝漢儒				余陳月瑛 李秋遠	余陳月瑛 李秋遠	余陳月瑛 李秋遠	余陳月瑛 許信良	余陳月瑛 蘇洪月嬌 黃玉嬌 林義雄 張俊宏	余玲雅 蘇洪月嬌 黃玉嬌 游錫堃 蘇貞昌

（略語）參：省參議會、臨：臨時省議會、立補：立法委員補充選舉、立增：立法委員增額選舉、國·非國：國民黨議員席次·非國民黨議員席次

（注）屬於青年黨籍的議員有李萬居、郭雨新、蘇洪月嬌、游錫堃，民社黨籍的議員有謝漢儒、李秋遠、黃玉嬌；郭國基在省參議會時期屬於國民黨，之後為無黨籍；許信良雖然是國民黨，但之後因為與黨中央對立而被開除黨籍。

透過選舉當選，背負著民意而挑戰國民黨的黨外議員並不限於這六人，但這六人宣示了民主主義的理念與原則來向政府挑戰，從這點來看，五龍一鳳的存在感與其他黨外議員完全不同⁷。這裡想先明確界定「黨外」這個名詞，在五龍一鳳的時

⁷ 例如連續五屆當選省議員的黨外議員余陳月瑛（第2、3、4、5、6屆）就表示，她雖然與其他黨外議員進行合作，但並不參與有關國家體制與意識形態等相關議題，而是將精力放在地方建設與教育問題（臺灣省諮議會編、余陳月瑛口述，前揭書，頁24-25）。

代，黨外這個名詞廣泛的被用來指國民黨以外的政治人物，可是在整個中華民國政治史的發展中，青年黨與民社黨雖然屬於國民黨政府的友黨，但如同後述，大部分的台灣地方政治人物僅將青年黨與民社黨視為暫棲之地而入黨，同時也保有身為反國民黨的無黨籍議員的意識，沒有改變自己的行動。只是也存在著雖未獲國民黨提名但並非反國民黨的無黨籍議員，過去為了明確對此進行區分，也有所謂「真正的黨外」的用語。而本文在沒有特別說明之處，將所有的反國民黨的非國民黨政治人物都以「黨外」稱呼。另外到了 70 年代後期，由於「黨禁」的關係，「黨外」這個名詞也廣泛被認知為是採取組織性行動的反國民黨勢力，成為一個的固有名詞。這個過程也就是在野的政治人物透過《台灣政論》等雜誌集結，於 77 年地方選舉時組成了「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了共同政見，並且召開了座談會與記者會，開始朝實際的政黨發展⁸，在國民黨的壓迫仍然逐漸成長，最後組成了「民主進步黨」。但五龍一鳳的時代，「黨外」這個名詞並沒有存在那麼具體且明確的概念。

那麼五龍一鳳時代的省議會之中，以他們為代表的黨外能否擁有足夠的存在感被歸類為是反對派？如果擁有，那麼他們代表了什麼意義？本文將以政治自由與人權的保障為前提，並列出三個指標以定義反對派，同時分析當時的黨外勢力的角色與意義，三個指標分別是：①有無議會民主主義制度；②選舉競爭是否在公平公正的狀況下實施；③議會有無表達反對意見的在野黨。從這三個指標，我們可以很明白的指出，當時的台灣省議會雖然沒有完全符合這三項條件，但反過來看，其實台灣省議會一定程度的滿足了這三項條件。當時雖然並未完全限制言論自由，但如果反政府的言論過度激烈，則會遭到嚴厲的鎮壓；「台灣大」的議會制度雖然滿足了①，但如果從本來被憲法予以保障的地方自治的觀點來看，其實制度上並不能算完備；②有關選舉的部分雖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大致上國民黨仍然透過作票等各種方式控制選舉；就③而言，省議會雖然存在著表達反對意見的議員，但他們並不具備政黨組織的條件。也就是從整個狀況來看，雖然當時的黨外還不能算是反對派，但仍然滿足了部分的條件。實際上五龍一鳳在省議會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希望能讓反對勢力可以完全符合上述條件。本文接著將從他們的言論對上述各點進行整理、討論⁹。

首先是關於第一個前提，中華民國憲法架構是以統治全中國為前提，而「台灣大」的議會民主主義就是屬於這個架構下的地方自治，根據薛化元的整理，五龍一

⁸ 若林正文，前揭《台灣一分裂国家と民主化》，頁 191-207。

⁹ 五龍一鳳在議會的發言紀錄不僅量龐大，且議題等方面也有所歧異。不過目前已經有部分研究依議員與議題將其進行整理、分析，其中因為收錄於台灣省諮議會編，《深化台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 年）一書中，薛化元的〈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時報對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與蘇端鏘的〈台灣省（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的兩篇論文針對議會民主主義的制度與運用方面的分析與本文關注的問題有所關連，因此相關討論將依據兩者的研究進行整理。

鳳在省議會提出有關地方自治的主張包括有：①地方自治法制化、②中央侵奪省級的權限、③省對縣市自治權限的侵奪、④黨化的問題、⑤省議員質詢權限箝制等五點¹⁰。李萬居在第一屆臨時省議會召開時就提出質疑，認為省議員依據憲法必須透過直接選舉產生，要求必須成立正式的省議會。郭雨新也曾經提案要求成立正式的省議會，並追問省主席是否有這樣的覺悟。郭雨新還提案，建議立法院應該要依據憲法制定原本就應該要立法的「省縣自治通則」，這項請願決議也獲得省議會通過。許世賢質疑了省主席的權限範圍，並批判省政府彷彿是中央政府的辦事處。吳三連則對行政院擅自修改省議會的決議，且事後未請省議會重新進行審查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郭國基批判中央干涉省營企業，甚至強調如果中央政府這樣做的話，乾脆將省營企業的名稱直接改為中央，或者乾脆解散省議會¹¹。五龍一鳳還批判省掌握了縣市應有的權限是侵犯縣的自治權；認為議會修改議事規縮短議員質詢的時間，是限制民意代表替人民辯護的時間，對此與以抗議。另外也不斷的質疑有關強迫教師加入國民黨是將公家機關國民黨化的行為、省政府挪用預算支持國民黨活動的合法性等問題。

第二，五龍一鳳經常提案與質詢有關選舉不公的問題。省議員從 1954 年的臨時省議會起改為直接選舉產生，但國民黨透過強迫入黨等方式對候選人施壓，黨外議員都是在受到來自國民黨的壓力的不利狀況下當選，理所當然會對此類問題特別敏感。五龍一鳳分別透過各種角度批評包括選舉法規的問題點、買票的情況不斷蔓延、發生於投開票時的不公等具體的選舉不法行為。

第三，結社自由可以說是組成反對黨的核心價值觀，李萬居對此在臨時省議會質詢，認為這些自由必須獲得保障，郭雨新與吳三連也作出同樣意見的發言¹²。當國民黨開始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導致地方的政治菁英的自由空間越來越被限縮時，正好 1957 年地方選舉的不公行為更加深刻，包括五龍一鳳在內的黨外人士準備利用這個機會組成「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但是兩次申請都因為「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等理由而未被受理。李萬居與許世賢在質詢時對於未被受理的理由提出疑問，並質疑在同樣條件下其他團體卻獲得受理的公平性問題¹³。在這個成立組織的動向後，五龍一鳳雖然開始推動不固定時間與場地的「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但是他們在省議會內並沒有正面要求組成政黨，可以說其提出的要求只針對組黨的前一個階段為止的程度。

如果是直接要求組成反對黨的動向，那麼雷震等人透過《自由中國》（1949 年

¹⁰ 薛化元，〈台灣省（臨時）省議會時報對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張—以五龍一鳳為中心的討論〉，台灣省諮議會編，《深化台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 年）。

¹¹ 薛化元，前揭文，頁 40-44。

¹² 蘇端鏘，〈台灣省（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為中心〉，台灣省諮議會編，《深化台灣民主、促進地方建設》（台中：臺灣省諮議會，2004 年），頁 52。

¹³ 蘇端鏘，前揭文，頁 53-57。

11月～60年9月)所展開的討論則較為明確，雷震等人就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以實現自由與民主的立場，不斷主張議會民主主義的政黨政治必須要有在野黨存在。《自由中國》對於反對黨的討論，是在50年代末雷震等人開始全面啟動成立新政黨的活動時逐漸升溫。除了五龍一鳳，包括青年黨、民社黨、無黨派的本省人政治人物也參與了組成新政黨的準備過程¹⁴，但國民黨政府因為外省人自由主義者與本省人黨外勢力的結合而感受到危機，組黨也因為雷震遭到逮捕而受挫。縱使如此，在基層社會擁有支持基礎的本省人黨外政治人物們仍然有他們必須要回歸的戰場，也就是「選舉與議場」。

從以上的觀察可以得知，五龍一鳳在省議會所提出的言論並非是正面突破組成政黨這個最後的關卡，而是謀求希望能在台灣這個區域實現完全的議會民主主義。幾位對於民主主義的原理擁有共同理解、又有辯才的省議員，利用在正統性上毫無疑問的中華民國憲法為盾牌，對以動員戡亂為理由進行黨的改造、集中權力以建構一黨獨大體制的國民黨政府進行批判，要求消除所謂「地方自治的赤字」。

但五龍一鳳並非採取過激的主張與行動來宣揚自己的理念，相較於日後的黨外立法委員，五龍一鳳在議場採取了非常穩健的態度，而非過激的動作。根據前省議員回憶，五龍一鳳不僅在審議時不會採取將對手逼到絕境的態度，與其他議員同事來往時的態度也不分黨派¹⁵。特別是李萬居與郭雨新獲得了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省議員的尊敬。李萬居在省議會展現了大前輩的風範，省議員不分黨派都非常尊敬他¹⁶。郭雨新與議員來往時不分黨派，而且態度親切。特別是郭雨新會替對方著想，在遭國民黨當局嚴厲監視的時期，他曾經拒絕了想與他深入來往的國民黨議員，原因是接近他可能會遭到當局無謂的懷疑，前途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¹⁷。吳三連、許世賢也因為談吐與態度高雅、高尚而為人所知¹⁸。另一方面，郭國基與李源棧因為個性豪放而知名，但他們的發言與行動也沒有到破壞議場秩序的程度。郭國基經常在自己的質詢結束後就立刻退席，有議員曾經問他退席理由，郭國基回答：「我是來講話的，不是來聽話的」¹⁹。多數國民黨籍的前省議員認為黨外議員對於台灣的民主主義有很大的貢獻，也有不少人認同他們的主張，當然這可能是因為這些前省議員現在是站在評價過去歷史的立場，才會做出這樣的發言。

黨外議員雖然是屬於議會的少數派，但他們也有佔優勢之處。相較於必須遵守

¹⁴ 蘇端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稻鄉、國立編譯館，2005年)。

¹⁵ 臺灣省諮議會編、李雅樵口述，前揭書，頁50；臺灣省諮議會編、林明德口述，前揭書，頁46、57；臺灣省諮議會編、黃光平口述，前揭書，頁11；臺灣省諮議會編、王國秀口述，前揭書，頁41。

¹⁶ 臺灣省諮議會編、林明德口述，前揭書，頁64。

¹⁷ 臺灣省諮議會編、黃金鳳口述，前揭書，頁61。

¹⁸ 臺灣省諮議會編、李秋遠口述，前揭書，頁31。

¹⁹ 臺灣省諮議會編、王國秀口述，前揭書，頁40-41。

省黨部與黨團指示的國民黨議員，黨外議員因為不受到這種約束而可以自由進行發言，且可以作出國民黨籍議員想卻無法作的質詢內容²⁰，國民黨籍議員有時也會認同他們的發言。也有人回憶，省政府其實很尊重黨外議員的自由，以省主席為例，省主席必須在省議會議場直接接受省議員的質詢，從周至柔、黃杰、陳大慶等外省籍軍人（1957～72），到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等本省籍的文人擔任省主席的時代（72～），縱使軍人出身的省主席會高壓的制止國民黨籍議員發言，他們對於黨外議員的發言則是表現出謙虛的態度，縱使是令人感到不愉快的發言，也會安靜的聆聽²¹。而最讓必須接受質詢的政府官員苦惱的，莫過於如何回答黨外議員的質詢。

也有人認為，黨外議員可以在議場自由發言的原因，是當局認為他們對社會的影響有限。李萬居的《公論報》（1947年10月～1961年3月）雖然對黨外議員的發言持續進行報導，但其他的報社幾乎都沒有報導省議會的審議過程。李秋遠曾經表示：「他們不過是在議場跟國民黨爭論而已」²²。由於也有人對《公論報》的影響力提出了正面的評價，所以有必要進行更細部的檢討，但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70年代後半，這個時期的黨外媒體擁有的影響力應該非常有限。

從以上的檢討可以發現，五龍一鳳充分理解議會民主主義制度、反對派存在的理由合理念，但他們是在被限制的體制內要求政府，希望盡可能使現狀能夠接近理想。他們實踐理想的戰場就是「選舉與議場」，不使用體制外的手段，媒體的運用也遭到限制。基本上是採取個人行動，雖然也會進行合作以掌握審議的主導權，但組織性的行動非常的薄弱。確實他們參與了雷震等人的組黨運動，但他們應該是因為有機會組黨所以才會參與，當雷震失敗後，他們又選擇回歸原本的戰場，也就是「選舉與議場」。雖然沒有辦法組成反對黨，但他們採取了屬於議會民主主義反對黨議員的態度與作為。

四、 黨外與黨外政治：從政黨體系的觀點所做的分析

那麼我們要如何從政黨政治的觀點，來解釋無法擁有在野黨的省議會卻存在著黨外勢力的現象？或者是我們能否將之解釋為省議會存在著政黨體系？

首先從青年黨與民社黨兩個國民黨當局正式承認的政黨來討論。省參議會的議員席次實際上是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事先進行分配而產生（30席之中，國民黨24、青年黨3、民社黨3），這樣的席次分配屬於國民黨為中心的霸權政黨體系²³。不過進入到臨時省議會時期，議員則是透過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選舉方式

²⁰ 臺灣省諮議會編、陳慶春口述，前揭書，頁40。

²¹ 臺灣省諮議會編、陳慶春口述，前揭書，頁39-40；臺灣省諮議會編、余陳月瑛口述，前揭書，頁27。

²² 臺灣省諮議會編、李秋遠口述，前揭書，頁31。

²³ G・サルトーリ（Giovanni Sartori），《現代政党学（新装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

的改變使得省議會的霸權政黨體系逐漸崩解。而且議員透過直接選舉從台灣各地產生，使得議員結構從半山人士為中心逐漸轉型為以本省人為中心，導致沒有深入台灣社會的青年黨與民社黨陷入了困境。

青年黨（正式名稱為中國青年黨）與民社黨（正式名稱為中國民主社會黨）因為在大陸參加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並依附於國民黨政府，因此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承認其為「友黨」，在國政層級也給予一定的職務。可是青年黨與民社黨在台灣社會基層缺乏存在感，原因是這兩個政黨的主要幹部無論在思想或行動都以統一中國為前提，主要是在美國與香港等海外地區活動。相較於國民黨透過地方有力人士深入台灣社會，青年黨與民社黨只能在少數地區建立據點。如果從省議員的席次來看，青年黨擁有李萬居、郭雨新、蘇洪月嬌、游錫堃，民社黨擁有謝漢儒、李秋遠、黃玉嬌等重要議員，兩黨看起來似乎仍保有一定的勢力，但筆者接著將分析實際的情況。

青年黨於 1923 年在巴黎成立，26 年在上海舉行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29 年公布黨名，主要領導人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雖然長期批判國民黨的一黨獨大體制，但也派出代表參加了 1947 年的制憲國民大會，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並且獲得了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職務。青年黨於 1949 年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不僅國會議員席次獲得保障，也仍在政府獲得重要職務，因此在「愛國、民主、反共」的旗幟下與國民黨政府合作，以推動反攻大陸這個大目標，但也仍維持實現監督政府、實現民主憲政的立場²⁴。可是實際上由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已經穩固，國民黨政府也每個月以「反共抗俄宣傳費」名義對青年黨提供財政支援，青年黨也藉此維持著組織的運作，成為了國民黨一黨獨大體制的一部分存在。

青年黨雖然也以獲得台灣的政治菁英支持為目標，但黨的最高領導人們以香港與美國為活動據點，加上黨組織因為「天馬茶房事件」後不斷發生嚴重的分裂與內鬥，因此深入台灣社會的工作只能依靠李萬居與郭雨新等在台灣土生土長的領導人的個人努力。可是除了在大陸時期因為對黨的思想有所共鳴而在法國留學時入黨的李萬居，本省籍政治人物入黨的動機多是受到其尊敬的領導人的影響、在野勢力希望在進行政治活動擁有一個護身符等等。1948 年入黨的郭雨新雖然曾經在黨的刊物表示是對黨的主義與目的有所共鳴而入黨²⁵，但是郭雨新身邊的人士所作出的證言與郭雨新的文字有所不同。雖然無法確切掌握其入黨的動機，不過有人表示，郭雨新是因為光復後親眼見到國民黨官員強權且粗暴的作為，以及遭遇二二八事件，身為一個立場非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為了從事政治活動時不受到國民黨的迫

年)，頁 381-394。

²⁴ 王覺源，《中國黨派史》（台北市：正中書局，1983 年），頁 378-380、475-476。

²⁵ 郭雨新，〈中國青年黨與我〉，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組，《中國青年黨建黨卅九周年紀念專刊》（台北市：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組，1962 年），頁 51。

害而加入了青年黨²⁶；也有一說是李萬居建議原本是無黨籍的郭雨新加入青年黨，以避免遭到國民黨的迫害²⁷。當時擔任郭雨新的秘書的陳菊也曾表示，郭雨新入黨後，對黨的現實狀況幻滅，多次對陳菊說：「那個青年黨沒有用啦！」²⁸。另外如蘇洪月嬌的先生，也是雲林縣的青年黨幹部蘇東啟，當初是國民黨員，但因為省參議員時代想投票給其尊敬的李萬居卻被禁止，因而轉至青年黨。蘇洪月嬌本人則是因為先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成為了先生在政治上的繼承人而加入青年黨，也當選議員²⁹。青年黨可以說是連被認為是黨的象徵的政治人物都只將其當成一個暫棲之地的政黨。

也是宜蘭縣名士的郭雨新所作出的貢獻更是需要特別說明。由於郭雨新支持層的人脈關係，據說青年黨在宜蘭有 300 到 400 名黨員³⁰，在宜蘭土生土長的游錫堃就是因為對郭雨新的憧憬而加入青年黨³¹。不過游錫堃後來雖然成為黨的幹部，但因為宜蘭縣黨部的預算太少而沒有固定的辦公室³²。游錫堃本人也回憶，他是透過青年黨領導人的著作，學習到所謂民主主義就是政黨政治、民意政治、議會政治³³。從游錫堃的談話可以發現，青年黨在政治啟蒙活動方面其實也達到了一定的成果。不過郭雨新採取公開、廣泛招募黨員的方式，而青年黨中央的態度卻是保密且慎重，雙方因此持續發生對立³⁴，這裡也可以看出青年黨的黨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著隔閡。

至於民社黨，則又比青年黨更像是本省籍政治人物的暫棲之地，民社黨是由張君勱所組成的中國國家社會黨、活動據點設海外的民主憲政黨於 1946 年合併成立，於 1947 年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不過黨綱的內容卻接近三民主義³⁵，也派遣代表參加同年舉行的制憲國民大會，與國民政府合作。民社黨在 1949 年與國民黨一起遷台，但黨主席張君勱前往海外，因此由徐傅霖擔任代理主席。不過民社黨也因為與國民黨的關係、「反共抗俄宣傳費」等問題而陷

²⁶ 張文隆，〈郭雨新（1908-1985）與戰後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168-169。

²⁷ 張文隆、陳儀深、許文堂訪問，《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08 年），頁 151。

²⁸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小組編，《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台北：時報，1999 年），頁 30。

²⁹ 陳儀深訪問、蘇洪月嬌口述，〈蘇洪月嬌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10 期（2000 年 12 月），頁 21-35。

³⁰ 張文隆、陳儀深、許文堂訪問，前揭書，頁 185-186。

³¹ 臺灣省諮議會編、游錫堃口述，前揭書，頁 10-12。

³² 張文隆、陳儀深、許文堂訪問，前揭書，頁 297-298。

³³ 臺灣省諮議會編、游錫堃口述，前揭書，頁 22-23。

³⁴ 陳正茂，《台灣早期政黨史略（1900-1960）》（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年），頁 202-211。

³⁵ 王覺源，前揭書，頁 373-375、474-475。

入長期內鬥，處於四分五列的狀態³⁶。

雖然有後來成為省參議會議員的謝漢儒等人努力在台灣建立黨組織，但與青年黨相比，民社黨更沒有培養出擁有身為黨員的自覺的本省籍領導人。民社黨採取的戰術是提名有實力的本省籍候選人參加選舉，首先是 1950 年當選花蓮縣長的楊仲鯨，接著有 54 年當選台北市長的高玉樹、60 年與 64 年當選基隆市長的林番王、68 年當選高雄市長的楊金虎，催生了許多黨外的地方首長。但這些本來是無黨籍的政治人物即使獲得民社黨的提名，被認為「當選後就忘記民社黨」、「所有參加民社黨的本省人中唯一沒有動搖，自始至終承認自己是民社黨的，就是楊金虎」³⁷。對黨外的地方首長來說，雖然「民社黨立即表示願全力支持...卻沒有一個人提到要如何支持、如何贏得選票的事」，「我不再對該黨寄以任何希望而獨自奮鬥了」³⁸。省議員也是一樣的狀況，民社黨提名當選的許世賢與李秋遠在議會都不被認為是代表民社黨，他們在議會的發言紀錄與回憶錄等文字紀錄也很少提到民社黨³⁹。所以在台灣地方政治上，民社黨與青年黨相比，是一個存在感非常小的政黨⁴⁰。

從這些狀況可以看出，青年黨與民社黨雖然在「選舉」的場合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兩黨的議員在「議場」與反國民黨的無黨籍議員沒有什麼差別，可以說完全不算是政黨。所以省議會的政黨政治的狀況，可以說是由省黨部與黨團所指導、監督的多數黨國民黨議員，與不屬於共同組織但立場是批判國民黨的少數派黨外議員的兩派對峙。這應該可以說是擁有政黨體系的特徵。

如果試著從薩托利的政黨系統來分類，只要議會存在透過選舉而產生的反對勢力，就不能算是執政黨完全掌控的「一黨體系」。議會民主政治是正統的政治原理，如果這個信念已經深入政治社會，即使出現了權力集中於一個政黨的狀況，該政黨也會因為無法獲得正統性而難以實現單純的一黨體系。但因為不存在足以稱為在野勢力的政黨，也不完全符合所謂壓倒性的執政黨與弱小的「次級政黨」競爭的「霸權政黨體系」。台灣省議會的狀況可以說比較接近薩托利所謂的「霸權政黨體系的前一步」，也就是在野勢力雖然可以參加選舉，但不被容許成立正式的政黨組織（連次級的政黨的存在都不被容許）。如果將之稱為「準霸權政黨體系」⁴¹，議

³⁶ 陳正茂，〈滄桑五十年—記民社黨在台灣〉，《傳記文學》第 91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37-42。

³⁷ 臺灣省諮議會編、謝漢儒口述，前揭書，頁 36。

³⁸ 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高玉樹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台北：前衛，2007 年），頁 54。

³⁹ 李秋遠在接受台灣省諮議會的訪談時，完全沒有提到民社黨的事情；訪談的附錄之中的質詢記錄裡，也只剩一小段提到「我是民社黨，或是黨外人士也好，我很樂意……以在野的立場幫忙國民黨……」（臺灣省諮議會編、李秋遠口述，前揭書，頁 119）。

⁴⁰ 臺灣省諮議會編、林明德口述，前揭書，頁 57。

⁴¹ 岸川毅，〈政党型権威主義体制と民主化〉，砂田一郎・白鳥令編，《現代政党の理論》（東海大学出版会，1996 年）。松本充豊，〈台湾の政党システム〉，岩崎正洋編，《政党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実際》（おうふう，2011 年）。

員透過直接選舉產生的臨時省議會開始的政黨間的勢力關係，就是屬於準霸權政黨體系，也就是國民黨與「無法擁有組織的黨外議員的集合體」的關係。五龍一鳳基本上就是在這樣的政黨體系之中以個人的方式進行政治活動。

五、 結論：「五龍一鳳」留下了什麼「遺產」？

那麼五龍一鳳等省議會的黨外人士們達到的成果，對之後的台灣議會政治造成了什麼影響？我們能否由此找出其與之後的世代之間的延續性？最後將對此進行相關的分析，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論。

第四屆省議會召開時，五龍一鳳只剩下郭雨新與郭國基仍擔任省議員。郭雨新當時遭到當局不斷強化監視與壓迫，正迎向議員生涯的最後階段（郭雨新放棄參選第五屆省議員，雖然參選了 1975 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但因為疑似選舉不公而落選，最後前往美國）；郭國基則是健康狀況不佳（雖然在 1969 年的立法委員增補選當選，但 70 年就過世）。另一方面，許世賢在 1972 與 76 年的增額立委選舉當選立委，將活動舞台轉移到立法院，此時也正是立法院的結構逐漸朝「台灣大」轉換的時期。

而五龍一鳳的時代結束後，取而代之的新世代分別有第五屆省議會的許信良（原本為國民黨籍，但因為和黨對立而被開除黨籍），第六屆的林義雄、張俊宏、蘇洪月嬌、黃玉嬌，第七屆的游錫堃、蘇貞昌。特別是第六屆有許多黨外議員當選，這些黨外議員採取了密切的合作，不僅經常一起用餐，進而轉化為密集連絡的集團⁴²。正如大家所知，這些省議員推動了黨外人士採取組織性的活動，這最後也成為了日後民進黨組黨的基礎。這個世代的省議員之中，有許多人在立法院開始定期改選後，將活動舞台轉移至立法院。

隨著世代交替，黨外議員的行動模式與戰術也開始有了變化。雖然基本態度仍然是遵守議場運作的秩序，但也出現了採取態度尖銳且不妥協的議員。如許信良（第五屆）在發表了描寫省議會實際情況的著作《風雨之聲》，導致了許多議員同事的反感。蘇洪月嬌（第六、七、八屆）與黃玉嬌（第六、七、八屆）雖然並稱為「南北雙嬌」，但後來黃玉嬌因為採取過激的言論與動作而受到注目，正好這也是議員開始積極利用媒體的時期，有議員同事問黃玉嬌為何要採取過激的言行時，黃玉嬌回應是為了被報紙報導⁴³。印刷媒體是當時的主流媒體，除了《台灣政論》等黨外雜誌開始發行，許信良以外的黨外議員也發表了政治活動的相關內容與主張的著作，如林義雄與姚嘉文的《虎落平陽》（1977）、林義雄的《從蘭陽到霧峯：瞧這個省議會》（1978）。另外如採訪省議會的記者陳婉真發表了《垂簾聽政治》（1977），

⁴² 臺灣省諮議會編、余陳月瑛口述，前揭書，頁 23。

⁴³ 臺灣省諮議會編、余陳月瑛口述，前揭書，頁 19。

鄭牧心發表了《台灣省議會之變局》(1980)等。

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如邱連輝(第五、六屆,但第六屆轉為黨外)、藍榮祥(第五、六、七屆)、林份廷(第五、六、七、八屆)等被稱為「頭痛」議員的國民黨籍議員。林份廷、劉邦友(第六、七、八屆)、鄭逢時(第七、八屆)、童福來(第七、八屆)甚至被稱為「四頑童」。這些國民黨籍的省議員有時也會基於大是大非的原則支持黨外議員⁴⁴,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因為省議會的氣氛開始改變所造成的。

那麼五龍一鳳對下一世代的黨外議員有什麼影響?從一般論來看,李萬居與郭雨新屬於基於民主的價值觀、在議會進行正統派式論戰的模範先驅,留給了後世深刻的印象。但能夠確認五龍一鳳所造成的明確影響,應該是屬於個人層次的部分。正如大家所知,郭雨新不僅在自己的故鄉宜蘭培養了許多後繼者(游錫堃、林義雄、陳菊等),也將自己在台北的家稱為羅馬賓館,提供黨外人士進行交流,協助黨外建立日後成為其活動基礎的人脈關係。另外一個案例是郭國基,黃信介就是因為旁聽了省參議會時開始對李萬居與郭國基有所敬意,特別是日後與郭國基頻繁的接觸而將其視為老師,據說黃信介在1969年立委增補選當選時,郭國基還對他說:除了你以外沒有第二個人,只有你才有辦法接我的棒子⁴⁵。

以上只能針對五龍一鳳給予下一代黨外人士的影響及其延續性進行的片段的分析,仍然需要更有系統的進行檢討。

⁴⁴ 臺灣省諮議會編、藍榮祥口述,前揭書,頁50-54。

⁴⁵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小組編,前揭書,頁5-6。

附記

本論文是岸川毅〈台湾省議会とオポジションの形成—党外議員の行動と戦略—〉《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18 号（2016 年 9 月）的中譯稿，在此向允許轉載的日本台灣學會報編輯委員會表示感謝，也要向兩位匿名審查者、翻譯本文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偉修表示謝意，另外編輯部在徵得本人同意後，調整了本論文註釋格式，這些修正並沒有影響到論文內容與作者的觀點。本論文也是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學術振興會提供的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 B「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課題號碼：2433004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歷

岸川 毅 Takeshi KISHIKAWA

學 歷 上智大學外國語學研究所國際關係論專攻博士班滿期退學

現 職 上智大學全球學部教授

研究領域 比較政治學、拉丁美洲政治、台灣政治

電子郵件 t-kishik@sophia.ac.jp

譯者簡歷

黃 偉修 Wei-Hsiu Huang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官方網頁 <https://weihsiuhuang.jimdo.com/>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2017年8月1日創刊

出版日：2018年7月1日

出版者：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會

編輯部：

主編：松田康博

副主編：清水 麗

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黃 偉修

助理編輯：魏 逸瑩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ul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uly 1, 2018 Vol. 2 No.7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in Taiwan's Provincial Assembly: Behavior and Strategy of *Dangwai* Assemblyme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